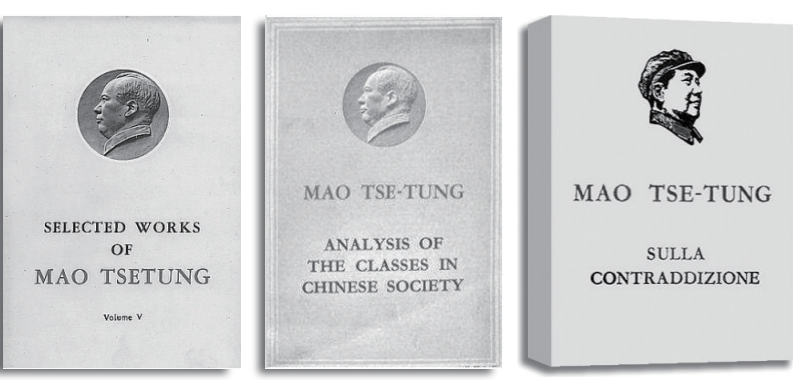


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



为什么毛泽东著作能够在海外广泛传播？



一步引申和发挥。如非洲一些领导人就把“纸老虎”引申为“被阉割的纸老虎”，“逃不脱被碾成肉酱命运的纸老虎”。再如“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在莫桑比克人那里，就转变成“为国家而死，保卫人民利益而死，这种死的分量像戈龙戈萨山（Gorongosa，位于莫桑比克境内，现有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一样沉重”。再如“军民鱼水情”的比喻，被用作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民族独立斗争的理念，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一员均能够接受和理解。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曾经坦言，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远离故土的丛林里与白人作战，一些战士因为思念亲人而开小差，最后是用毛泽东的军民鱼水这一理念，专门开办学习班统一思想，改变了战法，才取得了罗德西亚战役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队队伍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都被指战员所熟知。有一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向媒体记者介绍说：“我们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专门的一课是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官兵都知道毛泽东有句名言：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按照这一名言来处理我们的军民关系。”

毛泽东著作在海外哪些地区影响最大？

据方厚枢先生的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与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笔者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中东地区，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万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

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

在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都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代理中国书刊，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

据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在拉美地区，巴西共产党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等，以及乌拉圭共产党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的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在70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墨西哥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

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留给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毛泽东著作向海外传播了30年，塑造了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在世界上培养了一大批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朋友和伙伴。

（摘自2011年7月5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

“巾帼英雄”——秋瑾

□ 俞 苑

秋瑾（1875—1907），女，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她从小崇拜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

1904年夏，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创作的《鹧鸪天》抒发了她立志为国牺牲的心声——“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雄，夜夜龙泉壁上鸣。”

1905年，秋瑾回国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再赴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她创办我国第一份宣传民主革命的妇女报

刊——《中国女报》，号召妇女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07年2月回浙江，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与徐锡麟共筹在皖、浙两地发动武装起义。

为有效组织武装起义的力量，秋瑾整顿光复会组织，联络会党势力，组织“光复军”。她将光复会会员分成16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这首七绝诗中的前16字分别作为16级的表記。她还秘密编制《光复军军制》，将光复军全军分为8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字分别作为各军的表記。

她与徐锡麟联系，制定了皖浙起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大通学堂成为当时浙江革命的大本营。1907年7月6日，安庆起义失败，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恨恨自己壮志未酬，写

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7月15日从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

辛亥革命后，在她就义处建立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烈士灵柩安葬于杭州西湖西冷桥畔。20世纪50年代迁葬杭州鸡笼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现西冷桥畔立有秋瑾烈士全身塑像，接受世人缅怀。1912年12月孙中山莅临杭州亲往秋社致祭，题赠挽牌“巾帼英雄”。1939年周恩来巡视浙江，在绍兴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女儿争光”，号召世人向秋瑾学习。

（摘自2018年4月7日《人民日报》）



贺龙“网开一面”

□ 徐 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中国战场上，却出现了蒋、日、伪加緊勾結的严重局面。在山西，阎锡山为阻挠八路军接受日伪投降，竟派部队和日伪军“联合设防”，更乘机出兵配合蒋介石向晋绥解放区大举进犯。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8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主力部队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统一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进攻，同时对进犯的阎锡山部给予有力回击。

8月23日，贺龙指挥晋绥军南线部队陆续夺取了太汾路上的县城及离石、柳林、大武等城镇，30日，又组织独一旅和晋绥八分区部队向太汾公路上的文水县城发起攻击。31日，晋绥军参战部队冒着大雨来到文水城下，迅速完成了对该城的包围。黄昏时分，攻城战斗打响。独一旅冒着暴风雨，通过手拉

肩扛，把几门炮拉到了离城墙几百米的地方，瞄准城墙上敌人的工事进行轰击，压制敌人城上火力。随即，八分区二支队突击部队迅速越过壕沟，剪断铁丝网，扫清地雷，把云梯架在城墙上。经过激战，二支队登上了城东北角，并逐渐沿城墙向两翼发展。由于角度关系，炮兵无法摧毁北门城楼及城墙两侧暗堡火力，攻城部队虽然数次打退国民党军的反扑，但一时无法消灭北门城楼的敌人。攻城部队随即迅速改造敌人设在城墙上的工事，并以此作为掩护坚守已夺取的阵地，和敌人形成对峙态势。

独一旅首长闻讯后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炮兵连将几门火炮全部集中到北门，又命令独一旅七四团突击部队悄悄埋伏在城墙的西北角。9月1日15时，炮兵连5门山炮齐发，对敌人重兵据守的北门楼和城墙上的暗堡火力予以打击。敌人见状，慌忙将城上守敌向北门集中。独一旅七四团突击部队见敌

人中计，立即竖梯登城，很快占领西北角城墙，随后沿城墙向北门守敌发起猛攻。北城门守敌在二支队和七四团的夹击下很快被消灭。经过激战，东门和南门也相继被攻克。攻城部队突入城内，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一部分被歼灭，剩下的纷纷退往西城工事，准备固守待援。贺龙得到报告后，一面命令攻城部队消灭城东、城南、城北的残敌，对城西残敌固而不攻；一面命令部分部队迅速赶往西门外埋伏。当日傍晚，残敌果然舍弃工事从西门突围而出，却钻进了贺龙事先布置的“口袋阵”里，除少部分被歼外，其余全部投降。

此次战斗，晋绥部队击毙伪兵长以下200余人，俘虏600余人，缴获轻机枪40余挺、掷弹筒3具、步马枪400余支。第二天，贺龙进城看望攻城部队，文水万余群众在城内集会，欢庆胜利。

（摘自2022年3月24日《人民政协报》）



刘伯坚：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 陈春美 马晓敏

2022年，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85周年。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牺牲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刘伯坚，就是牺牲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党的早期组织发起人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他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志存高远。面对豺狼当道、列强入侵的残酷现实，1920年6月，他远渡重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1920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名，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中国革命的先驱。刘伯坚与他们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沙洛瓦、苏联莫斯科等城市一起学习、生活、战斗，发起和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刘伯坚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历任中共旅比（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11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8年春，刘伯坚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旅欧期间，刘伯坚介绍聂荣臻、蔡畅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30余人，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与旅欧支部成员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组织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等。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使刘伯坚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不属于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迅速地锻炼成为党的优秀组织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

红军学校的创始人

1930年，刘伯坚来到中央苏区工

作。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刘伯坚建议办一个“红军随营学校”（也叫“马背上的红军学校”）来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他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对刘伯坚说：“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1931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建校，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政治干部学校。

刘伯坚说，“一个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会打仗，还要学政治，学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他负责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为学员量身设计课程、安排师资。课程结构包括五分之三的军事课和五分之二的政治课；课程内容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锻炼；师资既有专职军政“教授”，也有兼职“教授”。红军学校不打仗时就学习，战时就到前线指挥打仗，战前做宣传鼓动工作。刘伯坚是红军学校的组织者、教育者和领导者。他为此更忙碌了，

不仅和战士们一道参加艰苦的行军、转移、反“围剿”战斗，一有空隙还学习和备课，到红军学校去上课，与学员交流谈心。在他的努力下，红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干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五军团的奠基人

为了争取爱国将领冯玉祥共同北伐，1926年，刘伯坚应邀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重振军威，士气高涨，为后来东出潼关、会师郑州，争取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是什么让一败涂地的西北军起死回生？就是刘伯坚的政治工作。刘伯坚经常给士兵讲“新三民主义”“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等。他的讲话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在军中流传着“听刘主任一席讲，当关两月薪饷”的口头禅。在他的影响下，刘振亚、袁血卒、王超等同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刘伯坚也给董振堂等官兵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后来的宁都起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西北军的一部分）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让全体官兵义愤填膺。“联合红军，北上抗日”成为爱国官兵共同的呼声。于是，刘伯坚就成为第二十六路军的“救星”。正如季振同所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于是，董振堂等派人探听、寻找刘伯坚。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在刘伯坚等人的周密组织、策划下，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毅然加入红军。“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壮大了革命力量。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如何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红色

劲旅？这个重担又落到了刘伯坚身上。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党的组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红五军团很快成长为中央红军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红色铁流。在攻打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中，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肉搏，让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10月，刘伯坚站在于都河畔送别远征的战友，并鼓励他们要勇敢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粤军团长劝降他，但他从未动摇过。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敌人让他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大余县青莱街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来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却气宇轩昂，高声朗读着那首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带镣行》。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他给妻嫂凤笙等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绝命书。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极其光荣而壮丽。他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他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勇毅前行。

（摘自2022年第8期《党史文苑》）